

碎布集

序



文化藝術

I217.2

416

2

碎 布 集

林 元

文化艺术出版社



B 786695

碎 布 集

林 元

*

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5 字数 321,000 插页 8

1991年 2月北京第1版 1991年 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 册

ISBN 7-5039-0510-7/I·282

定 价: 6.50元

1987年10月，林元同志在桂林参加“全国艺术研究刊物座谈会”。这是他最后的工作遗照。



1984年11月1日上午，林元同志为《文艺研究》组稿，拜访钱学森同志。



1963年10月，林元同志与爱人钱云同志游天坛公园。

述水牛華六五
 示幾少愈
 燕移平
 花海濟為我
 幸而六月十五
 時子致遠
 戴河海濱
 酒為我
 作日
 三五

林元同志手迹。

目 录

序 冯 牧 1

狱中枪声 8

一页伟大历史目击记 14

两株新苗 22

看山还是故乡青 28

镜泊湖上寻虹记 33

记一位爱国学者 38

——纪念陈序经先生逝世二十周年

平壤街头 47

——重建平壤的蓝图

寄平壤 53

赤道阳光 59

两洋的项链 62

——印度尼西亚访问散记

印度尼西亚人 67

画家亨德拉 74

在艺术的森林旅行 82

科伦坡之窗 89

游康提 · · · · ·	94
——访问锡兰杂记	
两听中华牌烟 · · · · ·	98
长城留名 · · · · ·	103
——记阿尔及利亚的两位朋友	
从《蛇岛的秘密》所想到的 · · · · ·	108
菊花·茅台·友谊 · · · · ·	113
——悼念松冈洋子女士	
读《项羽本纪》 · · · · ·	121
黛玉的悲剧 · · · · ·	126
漫谈白石老人题画 · · · · ·	141
白石老人的童心 · · · · ·	149
白石老人的《荷花倒影》 · · · · ·	152
《太湖风光》好 · · · · ·	155
——给画家李流丹的一封信	
画如其人 · · · · ·	158
——《李流丹版画集》序	
要使丹心常如铁 · · · · ·	165
——记画家宗其香	
文如其人 · · · · ·	169
——谈杨朔散文风格	
关于《又见蔗林，又见蔗林……》的 通信 · · · · ·	198

忽闻诗坛重铎声	203
——读长篇诗论《诗海明珠》	
《胡桃坡》与形象思维	207
文艺要与科学“杂交”	258
大学生	261
王 孙	268
——大学生原型之二	
大 牛	283
——大学生原型之三	
海河庄	306
纪念册	320
归 家	324
一枝四十年代文学之花	383
——回忆昆明《文聚》杂志	
从《观察》到《新观察》	395
笑对苍天做嫁衣 王致远	411
——编后记林元同志	

序

• 冯 牧

清明前夕，突然传来了林元同志不幸去世的消息，一种深切的痛惜之情使我的心中好象遭受了沉重的一击。我和林元同志的友谊交往算来已有三十一年的时间，那是从一九五七年底，我奉命去接办刚刚受到了近于摧残性打击的《新观察》时开始的。在被改组的《新观察》编辑部留任下来的几位主要编辑人员当中，林元同志是从一见面就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一个。我在《新观察》工作的短短一年来时间中，我和他们相处得很融洽，合作得很好。那时，还不具备如像现在这样的思想解放的大气候，但我不论从林元身上或从另外一些同志身上，都可以感受到一种共有的真诚的愿望和感情，这就是：尽管我们谁都不可能抗拒或抵御当时正在席卷神州大地的极左思潮，但是，我们应当使我们的刊物办得尽可能为广大的读者所喜爱或所乐于接受。我真切地感觉到，在包括林元在内的

几位当时的刊物骨干力量的心中，都具有这样一种可以说是心照不宣的心情。

在这期间，我发现了林元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对于一个编辑来说是极为可贵的品质。我发现，这个当时还没有入党的老编辑，在工作中所表现出的炽烈的劳动热情、忘我的工作积极性以及接近于足智多谋的编辑工作才能，使我们当时濒于瘫痪的刊物，很快地便恢复了正常的工作运转。我应当坦率地说，在我刚刚被调到《新观察》来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沉重的、不安的，也是毫无信心的；但是，很快我就感觉到，在我身边，有许多双友善的手在扶持我，帮助我，（而不是在排斥我）。而其中，林元就是非常突出的一个。我时时为林元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忘我无私、殚思竭虑的事业精神和工作热情所激动。也就是在这时，在讨论他要求入党的支部会上，我第一次了解到他的历史和生活道路，了解到他并不是以一个普通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的身分来参加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事业的。早在抗战初期，他就是一个追求光明、追求进步、追求人民解放事业的爱国者，一个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和革命文学运动并且做出了贡献的有理想、有信念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曾经在当时风靡全国、对蒋管区的民主运动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观察》杂志工作过很长时间，作为储安平助手，经过他的手发表过不少进步的革命的乃至是出于地下党员手笔的文章。在解放战争后期，他为此而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一直到南京解放，解放军战士打开了当时关押爱国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的政治犯监狱，他才获得了自由，才获得了真正的解放。当时，作为党外进步人士的林元，在监狱中表现得非常坚强，如同一名革命战士一样地和敌人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这一切，我都是在五九年讨论林元入党的支部会上才了解到的。而这些事实，在当时的情况下，当然都是经过了反复的严格调查之后才得出的结论。他正是因此而理所当

然地被接纳成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由此才使我对于林元有了更为深切的了解，我才开始懂得为什么一个被人们视为“党外人士”的编辑会具有如此自觉的责任心和似乎是永不会枯竭的工作精力。在我的印象里，当时出版的每一期《新观察》当中都包含着他的富有创造性的建议、心血和劳动成果。他是一个提选题、出主意、结交作者和组织稿件的能手。他自己也能写很漂亮的散文和很有见解的评论，但他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编辑工作上，正如他自己所常对我说的，“我一辈子都是为别人做嫁衣裳的，我对于当好一个刊物的编辑，是乐此不疲的”。林元的一生，确实是一直在这样身体力行的。早在四十年代初，他在西南联大时期就编辑出版过在当时颇具影响的进步文艺刊物如像《文聚》等，在那上面发表过许多激扬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的作品，许多作家（如象闻一多、冯至、李广田等）都曾经给过他以支持和帮助。从此，他就以编辑工作作为向自己的神圣目标奋力前进的工作岗位，而且做出了认认真真和切切实实的工作业绩，一直到他年过古稀，由于年龄和健康的原因，才不得不心怀栈恋地离开了他在《文艺研究》编辑部的办公室。

因此，在我的思想里，林元是在我们当中的一位极其难能可贵的、把毕生精力和心血都奉献给文艺编辑工作而且做出了昭著成绩的好同志、好编辑。尽管他在有一段期间调到了文学外事部门，而暂时离开了编辑工作，但我相信这并非出于他自己的意愿。我永远把他看作是一个在文学队伍中自觉自愿地把自己的生命数十年如一日地投身于编辑工作的老编辑和好编辑，一个值得尊重和钦敬的毕生“为他人做嫁衣裳”而任劳任怨和甘之若饴的人。

象这样的人，在我们的队伍中实在是太少了。

我和林元在《新观察》工作期间结下的友谊，并没有因为我们后来分处在不同的工作部门而中断。在十年浩劫时期，我们曾经

一起被关在一间地下室中，并且一起在湖北干校劳动过，在这段期间，我们得以互相倾诉过自己的心境和经历。他时时自然流露出来的相濡以沫的感情使我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信赖。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他显著地消瘦了，银白色的头发也变得更加稀疏零乱；从他艰难迟缓的动作中我感到他正在竭力克制着自己的病痛。他告诉我，他得了糖尿病，这种病，在干校的条件下是一种灾难性的疾病。但他同时又说，他虽然时时感到痛苦，但他还是乐观的，他相信我们都能够顽强地生活下去，并且能够等待我们所盼望的那一天的到来。我相信他的说法，而且为他身上经常自然散发出来的乐观主义情绪所感染。至今，在我头脑中仍然不时闪现出他在干校参加劳动时的步履蹒跚的身影和他的虽然日见憔悴却永远坦诚而乐观的面容。

从一九七八年开始，我终于又获得了和林元在一道工作的机会。那时，我在文化部负责艺术研究院和政策研究室的工作。三中全会后，文化部决定筹备出版一个文艺评论和文艺研究的理论刊物，这就是创刊于一九七九年五月的《文艺研究》。我建议调林元来参与筹办这个刊物，我始终认为，在当时可供抉择的对象当中，林元是一个最为合适的人选。而后，他就把全部身心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这个刊物，简直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开始的两三年中，林元还都不是这个刊物的正式主编，但我现在应当公正地说，从一开始，林元就是《文艺研究》这个后来声誉日隆的刊物的实际上的创办者和主持人。我和另外两位同志都曾列名为刊物的主编，林元是编辑部主任和副主编；但是，如果说这个刊物从一开始就制定了一个至今看来仍然是正确的方针，如果说这个刊物在八九年的时日里曾经克服了众多的难以设想的困难，在这漫长的风风雨雨的岁月里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方针和目标，而没有随风摇曳和动荡不定的话，那么，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说：能够做到这

一点，林元同志在其中是起到了值得表彰和赞扬的重要作用的。从一开始，他就是以一种情投意合的积极精神和得心应手的工作活力，为这个刊物的从诞生、发展、坚持、巩固到稳步发展而付出了一个年过花甲的老年人所可能投入的最大的精力和干劲。他曾在重新工作前一次因公出差中跌断了腿，但他却泰然处之，无论有多大困难，只要需要，他就如打仗一样，不失战机，立即拄着手杖为了办好刊物和组织高质量、多品种的稿件而到处辛勤奔走。因此，我虽然在刊物创办之始曾经忝列主编职务并且参与过一些工作，为刊物的方针和指导思想的确定提出过一些建议并且和林元同志以及编辑部的其他同志顺利地取得了共同的想法；但是，刊物的实际的主持人是林元而不是我。我时常怀着一种欣慰乃至感激的心情，回忆起我和林元之间关于坚定不移地执行双百方针同时又要使刊物具有自己的鲜明主张和性格的多次讨论；我高兴地看到：林元在主持刊物编辑工作的几年间，对于我们所共同确立的方针和编辑思想，一直是信守不渝的。后来，他在别的同志的帮助和支持下，使《文艺研究》不仅在正确贯彻双百方针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而且在广开文路而又有所倡导方面，也逐步地形成了自己的性格。这一点，应当是有目共睹的，也是值得我们永远珍惜的。

林元同志在一九八七年终于离开了自己心爱的工作岗位，这是早在我意料之中的事；因为我看到近年来他是越来越衰弱了，他的外貌和举止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衰老得多；但是他的那种心无旁务，把全部思想和精力都扑在编辑工作上的极端负责的精神和毅力却使我为之深深感动。

我预感到他的来日无多了，然而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会那样早地便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的亲人和战友，离开了他如此挚爱的革命事业。他一生自奉甚俭，自律甚严。他去世以后，我和一些老战友一起到他家里去看望他的夫人钱云同志和他的子女。走进

他的俭朴的居处，使我有一种四壁萧然的感觉。当他的女儿林平把他去世前不久用断续无力的声音口授的遗嘱拿给我看的时候，我不禁潸然泪下了。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所发出的，是使一切正直的革命者都会感到悲痛和震动的声音。他在遗嘱中说：

一、遗体献给国家医学科研事业，不留骨灰；

二、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及追悼会，以免劳民伤财；

三、我一生喜爱并收藏齐白石老人四幅画。白石老人的画是国宝，国宝应归国藏、国有。

四、我一生为他人做嫁衣裳五十年，剩下一点“碎布”，约三四十万字，请王致远同志编成《碎布集》，并作长篇编后记，请冯牧同志作序。

五、《碎布集》出版后所得稿费留给钱云晚年生活。

回顾一生，所作坦然。妻子儿女待我之好无以复加。希望林平多关心妈妈，听妈妈话。妈妈也要多关心林平。我飘然而去，云游四海而无所挂念。

又及：关于《文艺研究》，希望王波云同志在全体同志共同努力下抓好工作，继续前进。《文艺研究》十年来的办刊方针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不断解放思想，贯彻百家争鸣，搞五湖四海。这已得到了王蒙、李希凡等领导同志的肯定，对此非常感谢。

林元

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一日

我捧着这份写在一张薄薄的信纸上的遗嘱，沉默良久，我的心在颤抖。这是一个一生为祖国文艺事业、也为他人的茁壮成长而劳顿奔忙的普通编辑工作者在临终时发自肺腑的声音。这张纸很

轻，但在我手上却有千钧的分量。林元已经永远地去了，但在我眼前，却仿佛长久地屹立着一个高大的身影，在他身上，一颗忠诚、炽热、纯朴、热血沸腾的心，正在不停地跳动着。

逝者长已矣，但有些事情对于如像我这样的幸存者，心情却不能平静。林元是一位为我国的新文艺事业奋斗过将近半个世纪的文艺战士。他为此曾经在敌人的监狱中进行过勇敢的斗争。然而，我听说，他在全中国解放前所进行的战斗和所做出的贡献，至今并没有被得到认可，因而，他在离开工作岗位以后所得到的待遇只能是“退休”，而不是“离休”，我作为林元的一个战友和故人，不能不为此而长久地悒悒于心。

按照林元同志遗愿（这其实也是他的朋友们的诚挚愿望），王致远同志在林元同志亲属的协助下，立即着手进行林元同志遗作的整理、编选工作。大家发现，他遗存下来的自谦为“碎布”的作品，并非如遗嘱中所说的只有三四十万字，而是有近百万字（包括未完成稿件在内）。经过王致远同志的辛勤努力，从中精选出三十万字，编成一本散文、评论、小说合集《碎布集》。我在阅读着这部倾注和浸透着一个具有崇高品德的老编辑心血的文稿时，不禁感慨万千。我不认为这部书只是一件由无数碎布编缀而成的“百衲衣”，而是一部既富有对于生活与艺术的真挚情感，同时又闪烁着可贵的艺术文采的有分量的著作。在全书的字里行间中，都能够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一个为了革命文艺事业而竭尽才智的美好心灵的自白，使我们清晰地听到了一个全心全意献身于人民和祖国的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坚强战士的声音，使我们确切地看到了一个永远把自己的生活目标和人民的利益融合在一起的正直知识分子所艰难地走过的道路。

狱 中 枪 声

母亲的生日早已忘记了。母校西南联大的生日却一年一度牵着我的心。这些年只要身体还走得动，工作抽得出空，五月四日这一天，就总要回北大去。今年的“五四”，我又回去了。今年虽不是逢五逢十大寿，但校门口从早晨九点起，就已车来人往，水泄不通了。新电教大楼门前，早已叙会着一大群联大同学。十点，我走进会场，但见一片芦花。是的，当年十多二十岁的少年头，加上四十九个春秋，不也该白了么？当然，也有不白的，主席台上八十多高龄的陈岱孙老师，就还是一头黑发。他正在清晰而有节奏地讲话：

“联大八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说的是抗日战争这一特定阶段，物质条件那么艰苦这一特殊环境，北大、清华、南开三个大学联合在一块，集中了那么多优秀的师资，培养出了无数的对祖国对人民作出了贡献的人。

夜里，虽然很疲乏了，我仍兴致勃勃地读着从会上带回的两本书刊：联大校友会第四期《简讯》和刚出版的一本厚厚的近四十万字的西南联大回忆录——《笳吹弦诵在春城》。《简讯》仅有薄薄的三十六页，却载着许多重如泰山的消息：“终年八十六岁留下学术论著近千万字”的“我国杰出语言学家王力逝世”；终年九十岁，四百万字的大型中国经济史《披沙录》的作者、著名经济学家“赵迺搏教授亲属捐献万余卷藏书和稿费”；“来华六十载桃李满天下”的“享年百岁的美籍教授温德在京逝世”；“‘两弹’元勋”、“我国杰出核科学家邓稼先校友追悼会在京举行”；还有“费孝通教授谈和平、发展与‘草根工业’”；“杨振宁校友谈要研究活的物理学”和一篇忆记华罗庚教授在西南联大的文章等等……这里列举的一连串闪光的名字，都是在“饮水曲肱成学业，茅盖筑室作经筵”的那个特殊环境里培育成的。

然而，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还培育出了另一种发光的人，那就是《笳吹弦诵在春城》的《前言》里所说的：他们中间有以闻一多、张奚若、朱自清、吴晗等为代表的无愧于中国知识分子楷模的令人敬佩的老师，也有为人民和祖国的前途、为革命事业献出自己生命的潘琰、李鲁连、齐亮、刘国铤、钟泉周……等烈士。

钟泉周烈士！读到这里，我的耳畔仿佛又听到三四响枪声。

那是三十八年前的事了。一九四九年春，百万解放大军压境江北，反饥饿、争民主的浪潮席卷京沪。蒋家王朝作困兽斗，叫嚷“借人头、平工潮”。上海江湾路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大监狱，挤得满满的。这里大部分是“政治犯”，有共产党员、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进步人士，有报刊的编辑、书店（上海海燕书店）的工作人员、学生（复旦大学）、工人，还有国民党的军官。我和难友雷柏龄是国民党反动派查封《观察》杂志迫害观察社人员被捕进来的。